

热风

思想论坛

主编 王晓明

从首尔到墨尔本

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

王晓明 朱善杰 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思想论丛 主编 王晓明

从首尔到墨尔本：

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

王晓明 朱善杰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 / 王晓明, 朱善杰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3

(热风·思想论坛)

ISBN 978-7-5458-0543-7

I. ①从… II. ①王…②朱… III. ①文化史—世界—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1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6076 号

责任编辑 马 睿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张志全

从首尔到墨尔本：

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

王晓明 朱善杰 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543-7/K·75
定 价 30.00 元

编者的话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介绍太平洋西岸各地文化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文选。

它缘起于五年多前的一个集体的心愿。

其时,文化研究正开始在中国大陆形成热潮,而在太平洋西岸一线的其他地方,北至首尔,南到墨尔本,文化研究更是早已大成规模,如火如荼。文化研究最早是起自英伦,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澳洲渐成声势,然后才在亚洲兴起,因此,很自然的,文化研究先天就有一种鲜明的“西洋”色彩。应该说,它能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各地很快地相继形成热潮,这个色彩也是一项重要的助力。但同时,对这色彩的明确的不满,也在亚洲各地的文化研究者中间展开来。越是积极地投入亚洲各地的社会运动、深入去回应本地的现实问题,文化研究者就越痛切地意识到,手中现有的那些出自欧美的文化研究理论,明显不够用;其中有一些,如果使用者对之缺乏认识,还可能对非欧美地区的文化研究造成很大的误导。于是,一种发展亚洲自己的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和分析工具的愿望,就在亚洲各地强烈地滋长起来。

和东亚和南亚的许多地方相比,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是起步相当晚的,成规模的研究状态的形成,大约比譬如韩国和印度晚了十年,也比台湾和香港晚了十年。但是,惟其如此,我们与这些地方的先行者,在发展亚洲文化研究的特性方面的深切共鸣,反而发生得相当快。

当然,要依照这共鸣指示的方向实地去做,绝非易事。亚洲固然不同于欧美,但亚洲的地域如此广阔,各地方的差别如此之大,又岂可一概而论?越是认真关注“亚洲”的“独特性”,就越会同时意识到,这个

“独特性”，连同其形容词“亚洲”，本身都还相当含混和空洞。当然应该努力去填实它们，但是，这个填实的第一步，却不能只迈向抽象的方向，而应该更多是相反，去了解和确认“亚洲”内部的差异。而且，这了解和确认不能被框限于现有的“亚洲”的地理边界线之内，那只是由现实的“国家”疆界划定的边界，它绝不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的边界，因此，文化研究应该在内外两个方向，不断开拓出新的视野，勾描出对象的新的轮廓。说得夸张一点，开拓亚洲文化研究的道路的第一步，正是要打破现有的各种对于“亚洲”的定见。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亚洲各地的文化研究者逐渐深入地交流各自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并由此了解彼此所面对的或相类或相异的社会状况。2000 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者开始参加这样的交流，因为起步晚了，我们的参与的积极性，还似乎更为热烈。不用说，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者的参与，也给这交流添加了新的推动力，并且，随着的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这交流不仅继续指向过去和现在，也开始指向未来：在深切了解亚洲各地的差异的基础上，发展思想、学术和社会运动等各个方面的长期合作，开始成为大家的共识。

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集体的心愿”。正是这个心愿，在四年前的春末，令首尔、东京、北京、台北、香港、新加坡和墨尔本的近二十位学者，聚集上海，与本地同行一起，在“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的总题目下，分别报告各自地方的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这些研究的将来的趋向和可能。

也正是这个心愿，令我们在这个两天的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决定编选本书。不但从这个会议的报告当中精选若干，还向出席或另一些并未出席这个聚会的学者，邀约若干其他文章。越是意识到，这是中国大陆——可能还是整个中文世界——的第一本意在彰显太平洋西岸各地文化研究的不同历史、现状和趋向的文选，我们就越愿意给各位作者以充分的时间，让他们能从容修改选入本书的各类文字。

感谢所有接受邀请的作者,他们都认真补充或改正了自己在会议上报告,有的还认真修订了早已发表的旧文。不过,毕竟还是受制于出版计划的时间上的限制,个别我们觉得应该收入的论文,依旧因为作者没能及时完成而不得不放弃。非常遗憾。

还要感谢本书的各位译者:我们选收的这些报告或文章,涉及不同地域的大量历史和现实材料,翻译起来非常繁难,是这些译者——当然还有作者的许多特别的帮助——的耐心工作,令本书得以克服因多种文字的交流而形成的困难,顺利编成。

编者

2010年5月 上海

目 录

1 编者的话

- 1 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热” 克里斯·希里(Chris Healy)
- 12 文化研究、澳大利亚及“亚洲”:基于教学和研究建立新的纽带
马嘉兰(Fran Martin)
- 23 对文化一般的研究还是文化的研究? 柳善荣(Yoo Sunyoung)
- 37 全球化与批判性文化研究的未来 李东渊(Lee Dong Yeun)
- 56 历史文化研究能否激进化? 朴姿映
- 73 在台湾教文化研究的问题与问题意识 陈光兴
- 94 文化研究的前世今生 李根芳
- 111 否想未来:在文化危机中过渡“江湖” 陈清侨
- 145 我们跑到哪里去?——东亚诸城市的亚文化与全球化,并论现
代文学的诞生和终结 千野拓政
- 167 坐标·雾障与文化研究 戴锦华
- 186 传媒文化研究在当下的意义及其可能 雷启立
- 197 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王晓明

- 213 文化研究 约翰·弗诺(John Frow)/墨美姬(Meaghan Morris)
- 238 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动向 陈光兴
- 255 韩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叙述学——话题的设定与布置 李东渊
(Lee Dong Yeun)
- 285 20世纪9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文化研究项目 王宏志

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热”^①

克里斯·希里(Chris Healy)(墨尔本大学英文系)

译者：张建琴(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 引 言

“文化研究热”这个隐喻容易让人产生许多联想,可能因为它暗指学术热情的短暂:一会儿热切无比,很快就变得冰冷麻木。一方面,“热”有激动疯狂、生机勃勃和充满活力的含义;另一方面,“热”又是危险的信号,指一种过热的情况,或是一个系统失去了平衡——就像多年前,我在悉尼的华裔澳大利亚药剂师在给我搭脉后常说的“上火”。这里,我想从风险和力量两个层面来探讨澳洲文化研究已采用和将采用的一些形式。我的论文基于我在墨尔本大学进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过去12年中,我一直都在墨尔本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教本科生和研究生。我们这个方向有五位全职教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学院人文学科的学者参与教学工作。曾经参与我们工作的成员有:迪派西·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和西蒙·都灵(Simon During),他们是本项目的发起人;鲁斯·巴尔肯(Ruth Barcan)、乔迪·布鲁克斯(Jodi Brooks)和安娜玛丽·杰高斯(Annamarie Jagose)发展了这个项目;马嘉兰(Fran Martin)和奥黛丽·月(Audrey Yue)将文化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我们本地区;艾莉森·杨(Alison Young)、迈克尔·达顿(Michael

^① 本文最早在2006年7月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迎接新挑战:西太平洋地区文化研究的过去和未来国际论坛”上宣读。感谢王晓明教授的邀请和盛情款待,也感谢与会的各位同仁。

Dutton)和芭芭拉·克里德(Barbara Creed)来自其他系,但是也教授涉及文化研究的课程;约翰·弗诺(John Frow)目前是我们学院的院长;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是我们学院的客座教授。我们的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在学术上起到了领导作用,如组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2002年起我们参与出版《文化研究评论》,这些做法都使我们在文化研究网络中成为主导。同时,我们与其他国际性的合作组织如亚际文化研究年会不断加强合作。下面,我将从我所在的机构出发,来论述文化研究的部分历史、现状以及预测它的未来。

二 热的开始:“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亚”^①

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出现在澳大利亚。当时,它并非是以一个具体学科的面目出现,而是约翰·弗诺所说的是“一种相对而言没有固定形式的潜在体,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且常常极为矛盾”^②。弗诺这番话有几层意思。首先,他认为不存在现成的文化研究的学科,可以被直接引入澳大利亚;第二,文化研究并不是作为一个单一的项目建立的。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澳大利亚,曾经出现过一些可能引起一股热潮的征兆,如一篇关于大众文化的期刊论文、一套新的人文学科课程设置模式或是一个符号学的创新研究项目,但实际上他们却没有带来文化研究中的具体作品;而其他的一些标志,如福柯早期的一篇译作、电影研究中的新作品、有关原住民电视的一个研究项目,反而以文化研究的名义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换句话说,约翰·弗诺同意格里姆·特纳

① 有不少学者都已经论述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读这两本经典作品:格里姆·特纳编的《民族、文化、文本:澳大利亚文化和媒体研究》,伦敦:卢特里奇出版公司,1993年;另一本是约翰·弗诺和墨美姬编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悉尼:艾伦·昂温出版社,1993年。最近的作品我推荐墨美姬(Meaghan Morris)的论文《纳税者的人文科学:一些问题》,《新文学历史》第36期,2005年,第111—129页;《理论和文化研究的交流》,《文化研究评论》第12期,2006年3月,第181—201页;约翰·弗诺的论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理论、故事、历史》,《后殖民研究》第10卷第1期,2007年3月,第59—76页。

② Frow,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p. 59.

(Graeme Turner)的观点,即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起源并不神秘;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来源于“电影和媒体研究这样一些早已确立的领域;从属于文学研究、高雅艺术和社会学等学科关于理论和实践的争论,或者,在学术圈之外,从属于女权主义;也被用作文化政策发展批判的手段”^①。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已经并将继续与学科性发生复杂的关系,与早已建立的学科保持不同程度的联系。

与此相对,显而易见的是,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首先产生于一些特殊的机构。这些机构就是从20世纪60年代为应对高等教育扩招开始建立的一批新兴大学^②。这些大学中的年轻学者们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法国拿到他们的学位。他们的专长是文学和电影研究、语言学和哲学。他们在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工作学习,建立了一个思想交流的特殊网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左派思潮的影响,许多人受到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和地区政治传统的影响。他们是“城市亚文化的一部分,社会背景复杂,靠小型的期刊网络维持联系”^③。他们的研究兴趣包括媒体和大众文化研究,特别是与文化权力、性别、种族和民族身份相关的大众文化的研究。他们热烈欢迎新的研究方法,并开展积极的实践。从广义上说,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热明显出现在澳大利亚,它散布于各个机构和学科中,既有理论性,又重视实用。虽然它有一个国际性的网络,但是学者们积极地进行地区性的研究,兴奋地将许多东西融为一体。

三 今日文化研究：永远的热潮？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层面上由政府政

① Turner, *Nation, Culture, Text*, p. 5.

② 正如弗诺所写的：“由于使用较少的文化资本同时拥有较高的学科创新性,这些新兴大学认为他们的研究,较老大学的研究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更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第62页。

③ Frow and Morris,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p. xxvi.

策的变化造成的。与英国大学系统相似,澳大利亚的大学系统由国家资助的大学占主导。20世纪60年代之前,大学系统规模小,主要满足培养精英的专业人士、科技人员和公务员的需要。60年代后,大学规模迅速扩大,给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提供了进大学的机会。更重大的改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几乎完全重新建立了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①。随着这些由工党政府发起的改革的推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成为一个统一的大众教育系统。到2005年,约有近100万学生就读于37所公立大学和3所私立大学。在扩大大学规模之外,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利用大学院校来解决国家生产力和国债的问题”^②。其结果十分明显。正如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和马克·康西达恩(Mark Considine)在2000年评价的:“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把大学看作是单独的独立机构,寻求并分享高等教育中的共同目标。这个时期已经结束。”^③借用他们的标题,我想说今日的澳大利亚的大学进入了国企大学时代。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在各个机构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澳大利亚每个洲和地区中,都有已经确立的、获得资助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研究的教学和科研部门。与其他联邦政府提供资助的研究相比,可以说文化研究比其他任何人文学科都更加成功,这一点在项目、研究员、研究中心和研究网络的资助中都是如此。文化研究有自己的组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从1991年起,这个协会每年都召开年会。去年的年会在悉尼召开,与会者超过350人,提交论文230篇,共召开了五次全体会议。在澳大利亚的期刊中,文化研究的主题占主要地位的期刊包括:《文化研究评论》、*Continuum*、*communal/plural*、《澳大利亚媒体资讯》,以及一系列网刊,如《M/C: 媒体和通信杂志》,还

① 这不是只在澳大利亚出现的一种奇怪的状况,而是一种跨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运动的一个部分。他们试图改变进行学术研究的物质环境和价值体系(我想把文化历史的教学也纳入其中)。这在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开始的改革,总部设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政策演变也体现了这一点。

② Hunter.

③ Morris, *New Lit History*. The Enterprize University, 2000, p. 114.

有一些与文化研究不发生直接联系但对这个领域十分感兴趣的期刊,如《后殖民研究》和《南方评论》等。在政府承认的学术机构——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文化研究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格雷姆·特纳(科学院研究员、文化研究教授、昆士兰大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在是科学院的主席,埃尔斯佩斯·普罗宾(Elspeth Probyn,悉尼大学性和文化研究教授)任理事会成员。还有一点在成就中没有提到的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直都是跨国流动、思想和文化产品传播的组成部分。

然而,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现状并不都是喜人的。我前面的介绍并未涉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者从事研究的政治文化背景。这是一种十分保守的政治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文化研究常被主流新闻当作批评学术界的代罪羔羊。尽管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近年来保守政治干扰政府资助,这也影响到了文化研究。从更广义上说,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公共文化权威相对薄弱,部分原因是保守派智囊的胜利,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学术界能够影响的受众的数量较小,范围较窄。一些社会运动的独立学者和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与文化研究的机构不再有联系,文化研究出版著作的机会也大量缩减。因此,如果说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澳大利亚的机构中形成了一股热潮并形成系统的话,这也未必不是一种险境,带着一种暂时性,热潮可能很快退去,只留回忆和美梦一场。

四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未来:热潮退去?

通常人们谈到“文化研究的未来”时,常常从总体的角度谈论文化研究。当然,在某些场合广谱的扫视是必要的,但在这里,我想说用微观的方式来讨论文化研究也有其优点。换句话说,我想分别讨论文化研究中具体内容的未来: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和科研。

首先,我认为文化研究本科教学的未来存在种种问题,因为我们

于文化研究在一所大学或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的位置还没有足够的讨论。可能“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项目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们”都认为存在经典文化研究这样东西,或是本科的课程内容可以从学术会议中有机地生成。就像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年会中的主题,如媒体失力、自然文化、流行音乐、电台、怪异文化、自觉感情(affect)、精神创伤、白人文化、舞蹈、性文化、记忆、涂鸦、批评小说(fictocriticism)、毒品、保健和亚洲电影等。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在澳大利亚,讨论和争论的缺失是墨美姬(Meaghan Morris)所说的“对本科教学的极大忽视”。很明显,这与教学的低下地位有关,同时教学和科研、教师的职业发展以及文科作为世俗职业三者之间的尴尬关系也导致了这一问题的出现。同时,这也是由学术批评文化造成的,因为学术批评文化热衷于进行学科反思。因此,正如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所言,“一种学科与对象间关系的进程被一种没有对象的学科取代,或者说,学科自身成为了对象”^①。

20世纪70、80年代,在新兴大学中干劲十足又深受欢迎的老师们的带领下,文化研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澳大利亚本科课程中。在早期的文化研究项目中,学生们面对的是一门建设中的学科及其全新的课程设置。文化研究关注并提供了新的方法来理解当代社会、消费者和身份文化、阶级和性别、文化政治和创意、主流媒体和亚文化的反抗等主题。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文化研究诞生的时刻也正是传统学科被学科间(尤其是文学和历史研究)和跨学科的讨论重新定义的时刻,例如对“理论”^②(Theory)的讨论。对学生而言,新出现的学科多元化倾向给他们提供了大量选择来开展自己的研究。对学者们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既可以在传统学科下做研究,也可以在新的领域内进行研究。

与此相对,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在大学等机构中地位的确立,

① Bruce Robbins, p. 191.

② 参见《后殖民研究》的论文,第10卷第1期,2007年。

反而驱散或冷却了早期的学科热情和创造性。当前,有两种文化研究的本科教学模式正在呈现,在这里尽管我们只是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但是这些新模式仍然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种尝试是在昆士兰技术大学,由于文化经济的变化,他们最近将原来的人文社会系改名为创意产业系^①。“创意产业培养个人创造力和技能并提供各类高回报的职业机会”。这是昆士兰技术大学最新的系部——创意产业系的宗旨。他们与来自政府和行业的伙伴们紧密合作,将自己定位为昆士兰州乃至澳大利亚全国创意产业发展中的领导者,并希望成为创意产业全球网络的中心^②。

该系的教学内容目前涵盖时尚、电影电视、音乐音响、创意写作和文化研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因为它与技术教育的紧密相联,这是昆士兰技术大学建立的历史基础,同时也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其他职业教育机构建立的历史基础。与此同时,这一举措也是一项新改革的组成部分,这项改革以当代世界文化和创意产业为目标来进行新的本科课程设置;这个当代世界即是昆士兰技术大学为之培养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这一变化也和约翰·哈特里(John Hartley)和斯图尔特·加宁汉(Stuart Cunningham)两人的工作密切相关,他们两人都是这个课程转变中的关键人物。哈特里长期从事媒体研究的教学和研究,尤其关注新闻学。^③ 加宁汉也在媒体和传播学方面颇有建树,曾是格里菲思大学文化和媒体政策中心的副主任,托尼·本内特曾是该系的发起人和主任。他们两人都指出,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和媒体及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他们也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化研究和文化政策及产业的交叉研究对文化研究的细化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我的第二个例子来自我所工作的墨尔本大学。在这里,原来的文科本科教学拥有 50 个不同的专业,现在正在逐渐转变为一个综合性的

① <http://www.creativeindustries.qut.edu.au>

② <http://www.creativeindustries.qut.com/courses/study-options/>

③ http://www.creativeindustries.qut.com/about_us/staff-profile

人文科学学位。与昆士兰技术大学的课程变动相似,墨尔本大学这一新的文学学士学位的出现,也受到了高等教育所在的技术市场评价机制的激励,至少在部分方面如此。雇主们需要毕业生能够“了解他们的技能所应用的更广阔的背景,并随时准备着把知识运用到更大的范围中”。^①它依赖于一个比昆士兰技术大学的理念更广义的概念,即“变化中的世界”这一隐喻。在这个世界中,跨学科性、适应性和创造性是对所有即将加入全球劳动力大军的人才的要求。新的文科学士学位的建立试图在通才(了解大量知识的学生)和专才(深入掌握具体知识领域的学生)之间达到平衡。与此相矛盾的是,(真实世界中以问题为主导的)跨学科的影响将意味着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这样的项目将无法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下去(跨学科指的是来自多种学科同时对许多学科做贡献)。文化研究很可能与媒体和传播学融合,但同时它对许多其他学科的教学做出了贡献。

如果讨论昆士兰技术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的这些举措可能带来的结果,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至少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即远离学科性的课程和评价体系而引入了文化素质和技能课程。这些转变可以为细化文化研究本科教学提供有益的看法。在这里,我所说的文化素质,并非是新阿多诺式的学生培养项目,也不是单纯的读写习惯;我指的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分析能力,关注文化修养的培养,重视了解和利用文化的技巧,而非仅仅知道一些皮毛。这种课程应秉承公民世界主义,而不属于国家公民课的范围。它与批评和批判的关系不大,更着重于文化生产技能的学习。我知道,这一简单的讨论只是抛砖引玉,但我相信,在各个机构和全国范围内进行各类问题的讨论,有利于大学文化研究教学的未来。

那么,文化研究的研究生培养的未来又是如何呢?很显然,“企业大学”的逻辑要求进一步扩大全球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塑造“大学”的

^① <http://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courses/melbmodel/keys.html>

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要,如在国际高校联合体(Universitas 21)^①中体现出来的互用性和互容性。但是,随着在全世界各地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大学在争夺学生“市场”的过程中也引发了竞争和区分。事实上,澳大利亚许多大学通过吸引大量亚太地区付费上学的学生得以在政府支持日益减少的情况下生存下来。至于文化研究,一些澳大利亚大学目前正试图将专业研究生项目(主要是修学分拿到硕士学位)定位于地区市场,但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文化和媒体研究或文化政策的交叉研究。当然,文化和媒体政策在很多方面是全球性的(如因特网的某些管理政策),但是从语言到国家政治框架这样的地区力量也同样强大,可能会限制这些研究生项目市场的扩大。

另一方面,当前文化研究的越来越多的博士培养采用跨国合作的模式,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全球学术人才市场、著作和杂志的全球发行、邮件网络、博客、学术会议和合作研究。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而言,目前从英国沿袭得来的博士培养模式主要关注博士论文的写作,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这个模式培养出来的。这一模式有两个严重问题。首先,这使澳大利亚的毕业生在与北美以及其他地方的毕业生竞争时处于劣势,因为这些地方的学生,在总体上比澳大利亚的博士生花更长的时间完成博士学习(通常至少5年有资助的学习),他们的学习包括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同时也包括正式的职业发展的训练。第二,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的博士培养计划没有利用到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和人才,这些都是大学在为政府服务的过程中获得的。除了这些缺点,澳大利亚的制度也有其优点。我常常为澳大利亚毕业生博士论文的创造性所激动,他们没有美国学生论文中常有的那种过分小心,他们不会花过多精力去界定他们的研究范围或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他们的研究领域进行积累,这种谨慎有时会遏制创造力。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要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也不是表示对精英研究生院的支

① www.universitas21.com

持。已有许多人对澳大利亚现有研究生培养的缺点提出了许多改善或是补足的办法,有些关注我们自身的监督措施,有些着重各种制度建设。我只是提议,基于这样的一些措施,我们需要在日益分化的背景下更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

最后,我想探讨一下澳大利亚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未来。在最广义上说,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公共文化,通过媒体和大众文化各种形式,透过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政府对行为的管理来探讨权力的运用,这种运用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限制性的。总的来说,这样的研究认为文化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在其中可以建立意义,形成身份,将领导权的形式进行分级。这样的研究,通常是非常优秀的研究,还在不断涌现。在这里,我想指出在过去一些年中开始出现的一种不同的趋势,这种趋势认为文化研究的科研开始脱离文化研究的范式。^①

如果我们将文化研究的那种模式与一些在公共卫生部里进行的类似文化研究的工作比较,或是与西悉尼大学里各种各样受委托进行的或其他的研究工作比较,甚至与文化研究网络中出现的研究相比,我认为文化研究的范式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同的特征,值得我们思索。这种类型的研究不是最早吸引我进入这个领域的那种研究;以前,极有才华的学者们研究某一特定时刻的具体对象,从中找出文化的内涵。^② 这类研究通常需要高度的归纳和分析能力,这种归纳和分析能力来自学科训练的培养,从中我们常常发现高度个性化的有创造性的跨学科研究。

与此相对,对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更精确地说,文化研究项目)可能并非来自个人或具体学科的好奇心,而是来源于一个更广阔的变化的领域,并以合作的方式进行。因此,这与原来的做法不同,

① 伊恩·昂和《文化研究评论》参考文献。

② 墨美姬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类文化研究的典范。